

道表儒里的不同变奏

——嵇康、陶渊明家风的异同探微

安 亚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魏晋名士嵇康和陶渊明都有着放浪不羁的个性和崇尚自由的追求,他们用清高的品质,铸成了文人气节的铮铮铁骨。二人都曾在教育子女方面孜孜不倦、细心体贴,爱子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主张及家风造成了育子方式和方向的不同。

关键词:嵇康;陶渊明;家书;育子;超脱世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6)06-0099-04

魏晋时期,诫子书盛行。诸如嵇康《家戒》、诸葛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陶渊明《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王僧虔《诫子书》等等,诫子书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虽然只有短短近四百年的历史,却是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段。国家四分五裂,各方割据势力争权夺利,连年战乱,造成生灵涂炭,百姓朝不保夕。曹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14)}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同时,诫子书的流行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关,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时注重才能与门第并举。而到了西晋则独重门第,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左思的《咏史》八首其二云:“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是对当时门阀制度的控诉。于是,一些作家就通过诫子书通过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以诫子书的形式多方叮咛,以期子女们勿忘家风,重整家业。嵇康的《家戒》、陶渊明的“命子”便是如此。

一、性格上的放浪不羁

(一)崇尚自然的天性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2](178)}他常常是“循性而动”,不拘小节。且潜心玄学,喜好老庄。其玄学思想核心亦是崇尚自然。他在

《家戒》中开篇便提出“人无志,非人也”,强调守志的重要性:“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2](495)}嵇康就认为“无心守志”“自然而然”便是守志的最佳表现。嵇康这是受老庄思想影响,“以柔克刚”尊重天性。他甚至大胆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可见其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也是崇尚天性的人。他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随性,无所束缚。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这样谈到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3](363)}这篇文写于陶渊明的晚期,在这里他不仅再次言志,而且希望教导自己的孩子要随性。当然,陶渊明本来的愿望是期望自己的孩子“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但是在《责子》篇中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们并不成器。陶渊明只好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戏谑的口吻更添了几分率真。所以,晚年的陶渊明也欣然接受

收稿日期:2016-05-04

作者简介:安亚(1989-),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了自己孩子的“不肖”，只求他们秉承父志，向“羲皇上人”靠拢。陶渊明尊重天性亦如此矣。

(二)谈玄饮酒的嗜好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这与当时黑暗统治者对言论的压制和人们朝不保夕的生命的忧患有关。魏晋时代不仅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而且还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品评人物成为当时的风气。而人物的品评就是以“谈玄”和“饮酒”为标准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为名士。”^{[4](764)}嵇康和陶渊明亦如此。

嵇康生活在曹魏末期，陶渊明生活在晋末，都身处易代交替的时期。嵇康生活在司马氏统治时期，司马氏实行高压政策去压制文人。所以当时有“魏晋名士减半”的说法，人们多半是敢怒不敢言。当时的嵇康颇有才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司马氏集团一直想拉拢嵇康，被嵇康拒绝，嵇康的死就是因为他不服司马氏集团而被杀。由于当时社会盛行“谈玄”与“饮酒”，所以嵇康在《家诫》中着重提出要慎重言语，遇人争论要装作自己不清楚，遇到酒宴，见人辩论，要及时离开，以防自己惹上麻烦得罪别人。这种嘱咐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而陶渊明更是嗜酒成性。“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3](344)}他也以自嘲的语气咏《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宋书》记载当时江州刺史王弘本想见渊明，被拒。于是王弘备好酒于庐山“半道”“邀之”，渊明“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5](2288)}。可见渊明爱酒竟到如此痴迷的地步。而他也写了《饮酒》二十首组诗，其五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和当时的“言意”之辩有关。

二、思想上的尚儒情结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魏晋时期的嵇康和陶渊明也不例外。虽然他们看似受老庄思想影响颇深，但我们在他们的诫子书中可以看到，二人皆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影子。

(一)教子入仕的嵇康

嵇康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曾对儒家传统提出批判：“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失题》）他曾大胆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开与儒家思想唱反调。然而他的《家诫》却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

首先，《家戒》着重提出人要立志，而且这个“志”

贯穿文章始终。正所谓“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明代张溥曾说：“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而这“礼”当然是儒家的“礼”。

1. “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则当谦言辞谢，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2](495)}在这里嵇康教导儿子要学会保全名声。儒家文化重伦理，讲礼义廉耻，为人处事重名节。孔子也曾云“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故名声对一个人非常重要。此为嵇康教子尊儒礼节之表现。

2.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2](495)}在这里嵇康教子在“守志”过程中如何坚持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此处提到“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这也符合孔子的理念：“三人行，必有我师矣。”“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同为嵇康教子尊儒礼节之表现。

3.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2](495)}此为教子做人要讲义气、心中有爱。这符合孟子提倡的“舍生取义，人性本善”的理论。嵇康教子可谓受儒家影响至深。

4.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2](496)}祸从口出，所以说话必须谨慎，能不说就不说，要学会忍耐。此语可与孔子说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谋而合。他还说：“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预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是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解，近论议亦然。”^{[2](496)}这就是说二人相争，如果来征求你的意见，即使自己心里明白是非曲直也不要回答。因为你不免总要赞同一方，而得罪另一方。他甚至说，如果在宴饮场合遇此状况，不如就把自己灌醉，以求解脱。就如《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做人原则一样“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儒家典型的中庸思想。儒学经典《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嵇康教子要在为人处事时学会中庸的生存之道。

5.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

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12](497)}这是教导儿子要做忠义志士,也是儒家所提倡的。

6.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12](497)}此番话又是告诫儿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道理。

7. “又愤不须离搯,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谓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12](498)}这几句又是告子要重礼节,不要失礼仪。

其次,可以看一看嵇康本人的作为。嵇康终因帮助好友吕安佐证而被杀,正是“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的践行者。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6](195)}嵇康便是如此。嵇康也是一个“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直性狭中”的人,他不曾为司马氏统治集团而低头,他的身上展现着孤高自傲的不羁人格,然而他在《家诫》中却表现得谨小慎微,少了份洒脱,多了份谨慎。鲁迅还提到:“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6](196)}生活在那样的乱世,嵇康自己成为时代的牺牲品,难道他要自己的儿子也消失在权威者的铡刀之下吗?所以他要自己的儿子学着“慎备自守”。

嵇康生活在魏末,他是曹氏集团的孙女婿,他固然是不会投降于司马氏集团的,王朝换代,要忠诚于前朝,这叫守节。即使抛开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不论,单是“守节”这方面,作为文人的嵇康也是断不会屈服的。但自己的儿子不一样,嵇康写《家诫》时他的儿子才十岁,他完全可以为司马氏集团效命,这说不上失节。所以嵇康写《家诫》希望自己的儿子做大官,这也是说得通的。曹操当时就是携汉献帝以令诸侯,按照当时的实力,曹丞相大权在握,他为什么不直接称帝?很明显就是怕大家心里不服他,他也不愿意留下篡汉的恶名。但他的儿子曹丕却顺理成章地称帝,却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很理解嵇康希望自己的儿子做官的心理。试想在封建社会

有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官作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嵇康也不能免俗,他的教子经中确有教导自己的孩子“与人无争、清心寡欲”的一面,但儒教思想却占据主导。唐长孺也曾说:“嵇阮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7](28)}从中可以看出嵇康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当然,嵇康的儿子嵇绍经他的挚友山涛的推荐,作了晋的秘书丞,官至侍中。在晋末八王之乱时,以身护卫晋惠帝,被士兵所杀,最终实现了父亲告诫的“忠”。

(二) 责子不成的陶渊明

陶渊明有如下诗句:“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达了自己厌恶官场和雅好自然的态度,所以便辞官归隐。然而,在他的《述酒》诗当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关心当时的政治,并非真正归隐。鲁迅曾在《隐士》一文中指出:“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6](225)}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一旦被他人知道,那就称不上隐士了。陶渊明这样的一位“隐君子”。

《命子》诗中通过“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世历重光”,对祖先大肆歌颂,说道“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寔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3](29)}。称颂先父性情淡泊,自己望其项背,心感惭愧。他写这些的目的,一方面是当时门阀制度严重,借颂祖以自勉。另一方面,是希望下文中提到的子女们勿忘家荣,要砥砺奋进,建功立业,使家族兴旺之火代代相传。他还在《赠长沙公族孙一首》中对长沙公陶侃极尽称颂和勉励。袁行霈指出:“观此诗,渊明宗族观念颇深。重门阀乃当时士大夫之习俗,渊明亦未能免也。”可知渊明儒家思想之深厚。

《命子》诗还说:“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

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3](29)}可知,渊明给自己的儿子所命之字(求思),追慕孔伋,以期其子能向孔子的孙子孔伋一样,成为大儒。“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渊明期子勤勉读书、积极入仕之深切期望于此可见一斑。渊明还说“凡百有心,奚特于我?”言外之意便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成器,显亲扬名,不是我一个人希望你如此,希望自己的儿子子俨能积极入仕的思想表露无遗。

《责子》篇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3](212)}诉说了自己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好纸笔”,大儿子子俨已经十六岁了,却懒惰成性。二儿子在本应“志于学”的年龄却不爱做学问。三儿子和四儿子都已经十三岁了,却还分不清数字。第五子已经将近九岁,却只知道找果子吃。一代名士如渊明者,儿子却如此不成才,不免让人心寒。然而,他又能怎么办呢?只得“且进杯中物”借酒消愁了。但从中可以体味到渊明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学有所成,为以后入仕做好准备的。杜甫《遣兴》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渊明并不能彻底地摆脱尘世的纷扰,但他天性乐观,既然诸子皆不成器,且随他们去吧。

《与子俨等疏》中开篇便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3](363)}用儒家“圣贤”颜回、子贡、子张、子路都免不了慨叹生命无常、岁月流逝来自我安慰。可见他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他在书信中引用鲍叔与管仲、归生与伍举、韩元长、稚春以及《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故事与箴言来告诫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且提到“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来自律,显然也是儒家所推崇的兄弟之道。

三、一样的深情,异样的风采

嵇康、陶渊明看似放浪不羁、不拘小节两个

人,对子女们深情的爱中包含着殷切的期望。嵇康在《家诫》中不厌其烦地逐条叮咛儿子怎样去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可谓殚尽竭虑、煞费苦心,我们看到“刚肠嫉恶”的嵇康也有温情似水的一面。同样,在陶渊明的《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中,我们也看到渊明对儿子最真切的爱。其中《命子》中的“厉夜生子,遽而求火”,丁福保注曰:此言凡一切有心之人,皆如厉之望其子真切,奚独于我如此。既见其子之生,实欲见其可,不欲见其不可。人言此情景最为真确。”最真切的爱也是最感人的爱。虽然嵇康对其子的爱俨然如老者面面俱到的千万嘱托,而渊明对其子的爱则仿佛是平平淡淡的随遇而安,但透过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最朴实无华的浓浓父爱。

嵇康、陶渊明不同的教育方式与生活背景又铸就了不同的家风。一个侧重应用型,一个侧重启发型。一个是在各方面高压制度下生活,所以变得小心翼翼;一个是在相对较为宽松的 living 环境下自然洒脱。一个为朋友伸张正义而身陷囹圄,由对自己惨痛经历的反思而告诫后代;一个愿继承父亲淡泊的性情,“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望子成才不得,从而愿其子随性而为。一个期望其子出入宫廷,一个只求其子和睦团结,平安度其余生。总之,由于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及各方面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家风。但是,笔者认为,两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在做人正直、谨慎、勤学读书等大的方面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嵇康和陶渊明以各自的标准塑造着不同的家风,或绚烂,或平淡,都是别样的人生。他们的诫子书时刻激励着历代的读书人,对现在的我们仍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参考文献:

- [1]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3]袁行霈.陶渊明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7]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